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级、公民和个体化

——基于 U. 贝克第二次现代性理论的分析

安晓波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 教授



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引起西方众多学者尤其中国问题专家的关注和兴趣。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当代中国学教授安晓波（Björn Alpermann）在 2011 年德国国际跨学科研究杂志《原社会学》（*ProtoSociology*, Vol.28）上撰文，尝试运用德国社会学家 U. 贝克（Ulrich Beck）的第二次现代性理论对中国进行例证研究。作者以近几十年来中国快速的社会变迁为背景，探讨了阶级和公民的社会分类及其在话语和结构上的演变，认为，U. 贝克的理论虽说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但其个体化理论却能够用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可以为进一步分析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起点。

绝大多数的学者可能都认同，中国在过去 30 年间经历了由三大因素推动的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一是经济发展，特别是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转型；二是经济体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三是全球化，即中国日益紧密地融入到世界市场之中并由此带来相应的社会和转型后果。这些特征，使得某些学者将中国归入扁平现代性的东亚模式（Beck and Grande, 2010; Han and Shim, 2010）。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对政治体制进行有限改革的情况下发生的。市场社会与共产主义政治的结合对长期来的有关现代化的理论设想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也促使人们去反思关于社会在快速现代化导致新社会分层的过程中是如何组织和重组的理论观点。

本文讨论了中国的社会分类及其过去 30 多年来的演变。鉴于学者认为阶级和公民在研究中国现代化经验上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此，本文特别着重研究阶级和公民，强调这两个社会分类的相互依存关系，并指出在中国研究中普遍使用的简单的“非自反性的现代化理论”阻碍了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入理解，而第二次现代性理论（正如贝克及其合作者所谓的“自反性的现代化”）对于超越“非自反性的现代化理论”是十分有用的。

一、贝克和第二次现代性

1. 第一次现代性与第二次现代性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就发表了一些激烈批评和富有争议的文章，从抨击诸如阶级、阶层或家庭等这类所谓的“僵化分类”着手，对当代社会学发起了挑战。之后，贝克的的社会学理论轮廓逐渐变得清晰，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现代性。“第一次现代性”是合理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社会基本变化所引起的。在贝克看来，它表现为明确的社会分类和社会差别，以及一种简单的、通常为二元的“非此即彼”的逻辑。但是，第一次现代性消亡的根本原因也隐藏在它的巨大成功之中，因为这种成功继而导致了现代性自身的

激进化，也就是贝克所形容的自反性过程：“现代化的现代化”。这样就产生了第二次现代性，它以模糊的属性概念、矛盾的“并列”逻辑和多重含义为特征（Beck, 1993; Beck and Lau, 2005）。贝克把第一次现代性的逻辑比作牛顿的物理学定律，而把第二次现代性的含糊逻辑比作为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则（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10）。

理解从第一次现代性到第二次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是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范畴，一是强制的个体化；二是（世界）风险社会；三是多维度全球化（或者“世界化”）。世界风险社会意味着第一次现代性的“工业规模”的巨大社会风险正在变得无法控制；同时，更多未曾预料到的后果也在变得清晰可见，现代化发展将为各种挑战提供解决方案的原有定论也因人为的不确定性（诸如气候变化等）而被侵蚀。而风险与后果的全球代际分配是高度不均等的，这就产生了克服“方法论的国家主义”和运用世界主义分析视角的需要（Beck, 2008; Beck and Grande, 2010）。因此，强制个体化定理就成了本文的主题。在分析个体化之前，需要澄清贝克理论中经常引发误读的某些观点。

第一，尽管按序排列，但贝克并不认为第一次现代性和第二次现代性作为清晰可辨的历史阶段存在着明确可见的中断；相反，第一次现代性的主要原则诸如合理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并没有简单地消失不见，而是被引入到第二次现代性之中。第一次现代性和第二次现代性的制度和原则同时并存是自反性现代性的并列逻辑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揭示这种共存如何导致新的社会模式是贝克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

第二，从第一次现代性到第二次现代性的转型发展过程既不是平缓的，也不是突变的，而是相当不规则的或者是间歇性的。

第三，贝克并不认为第一次现代性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所期望的社会秩序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主导标准和正常形式之外的例外现象是始终存在的。贝克强调，这些特例仅仅是对普遍接受模式的偏离。相比之下，在第二次现代性中，社会模式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已经被接受和认同了（Beck and Lau, 2005）。这其实就是第二次现代性的特征。

2. 个体化

根据贝克的理论，个体化是促使第一次现代性向第二次现代性转变的社会基本变化之一。在这里，个体化被看作是从根本上改变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过程。个体化不能混同于个体主义。它也不是个体生活方式的自愿选择或自我实现；相反，它描述的是一种向个体施以现代制度的基本社会学现象，因而也就是“强制的个体化”（Beck, 2007）。个体化包括三个维度：在支配和支撑的传统背景下摆脱历史规定的社会形式和社会承诺（解放维度）；在实用性的知识、信念和指导规范上丧失传统的安全感（失落维度），以及重新介入新类型的社会承诺之中（“控制”维度或“重新融入”维度）。

这样，当个体从先前的工业社会中包罗万象的诸如家庭、血缘、性别和阶级等社会分类中摆脱出来并在风险社会中作为社会再生产单位出现时，实际上同时也就伴随着去制度化、不确定化和再制度化。

3. 评价和适用

从贝克社会学思想的简要描述中，会自然地引发出几个问题。首先是先进西方市场经济下的理论有效性和适用性问题。自从贝克的文章“超越财产和阶级”初次发表以来的近30多年间，这一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大多数文章都涉及贝克理论中所指的阶级和其他社会分类随着个体正在成为社会再生产的主要单位而失去其重要性。这一理论假设获得了批判性的接受，特别是在研究社会不平等的学者中更是如此（Atkinson, 2007; Berger and Hitzler, 2010）。另一方面，不仅贝克及其合作者在努力捍卫自己的理论观点，同时，其他社会学家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从学术争论中可以得到的是，在个体化条件下，阶级和其他社会分类依旧有效，但内涵或许已经发生了改变。

当分析者在区分结构水平（哪个阶级还没有消失并且依旧在决定生活机会）与代表性或象征性水平时，这一点就变得最为清楚了（Berger and Hitzler, 2010）。在代表性和象征性水平上，个体化已经导致了对阶级的重估，阶级不再对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具有解释力。用G. 诺尔曼（Gerd Nollmann）和H. 施特拉瑟尔（Hermann Strasser）的话说，如果生产领域中经济和象征上的不平等直接导致社会分类和生活方式等再生产领域的不平等，那么使不平等结构化的“阶级理论极权主义”就遭到了质疑。诺尔曼和施特拉瑟尔等学者在使用基于阶级和不平等的行动人视角的解释学方法来研究社会不平等时，试图通过将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仅仅局限在再生产和生活方式领域来弥合两种研究方法上的分歧。他们不仅仅将此看作是研究上的“锦上添花”，而且对目前的研究模式也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对于有意义地理解调查中的统计相关关系更是绝对必要的（Nollmann and Strasser, 2002）。相似的是，A. 凯瑟林（André Kieserling）也注意到了——在观察社会不平等的因果关系上，社会科学家的视角会不同于社会活动家（Berger and Hitzler, 2010）。也就是说，学者所探究的个体是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往往把自身状态归因于机遇或偶然的单个个体。因此，贝克的观点不可能被大多数从社会结构角度来研究社会不平等的学者所接受，但却在代表性、象征性和寓意性的视角上至少是重要的见解。

此外，必须弄清楚的是，贝克从欧洲经验中得出的分析和假设在非欧洲和非西方的背景下是否适用。这一问题引发了大量的讨论。贝克也承认第二次现代性理论在此方面具有局限性，并且自世纪之交以来开始强烈要求和呼吁在社会研究上用“转向世界主义”来克服“方法论的国家主义”（Beck, 2000; Beck and Grande, 2010）。贝克据此认为，作为分析范畴和分析单位，不仅诸如“阶级”、“家庭”等已经偏离先前意义的僵化社会分类应该受到质疑，而且就连“国家”这样的分类也应该受到质疑的。根据他的观点，用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普遍接受的分析单位来研究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这会导致使全球不平等合法化意义上的“制度化偏差”：因为国界是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社会不平等是在单个国家中作为内部问题来讨论的，至多是在国家层次上进行总量比较。所不同的是，贝克提议使用“意外后果原理”（副作用原理）来确定分析单位，以便可以在撇开国界的情况下将所有受他国风险决定共同影响的人包含进去（Beck, 2008）。人们或许会反对这个提议，并坚持认为贝克多少是在用简单地提议一种范式转变和还尚未成为现实的新研究议程来回避欧洲中心主义的主张。但近些年来，贝克也已经开始更直接地提出将自己的理论命题应用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特别是东亚的问题。此外，其他的一些学者也加入了这场辩论。

例如，有学者（Han and Shim, 2010）认为，贝克的理论可以从构成主义的角度上理解东亚扁平现代性的独有特征，即第一次现代性的发展与向第二次现代性的转型几乎同时发生。他们认为现代性是靠官僚权威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议程来推进的（Calhoun, 2010）。但 C. 卡尔洪（Craig Calhoun）却相反认为，扁平现代性概念也是某种“常态”现代性。这显然是用欧洲经验作为尺度来判断非欧洲现代化的又一例证。他断言，第二次现代性的多样性原因反映了一种明确拒绝基于“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的社会模式的趋势（Calhoun, 2010）。但尝试用贝克的假设作为分析工具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时，还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原因：首先，已经有了大量关于个体化的中国个案研究，至少证明扁平现代性的概念可以在这一特定背景下被有效运用（Yan, 2010; Hansen, Svaverud, 2010）；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贝克第二次现代性多样性的研究框架开拓了全球范围内不同类型现代化过程比较研究的路径，而且也允许“个体化的多样性”（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10）。如果说其中还包含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因素，那么常用的现代化理论早期版本就不会取得进展，就不会被用于研究中国的社会变迁。

二、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分类

1. 改革开放前的阶级和公民

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后，阶级自然成为社会分类秩序中最重要的社会分类，并且它是政党和国家而非社会力量乃至个人所决定的。因此，它其实是一种决定公民权利的政治分类。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为所有家庭划分阶级成份的运动。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伴随着同时进行的经济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贴的阶级标签马上就失去

了存在的经济基础；相反，阶级标签成了纯粹的政治和世袭地位的标志。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阶级属性变得更加不稳定，政党和国家无疑在决定个体（或家庭）的阶级地位和社会身份上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除了阶级标签外，社会在结构和政治上的主要分界线就是城乡分界线。农民作为人民公社社员被束缚在土地上，就像城市工人在单位中“依靠组织”一样（Walder, 1986）。在城市和农村人口之间，资源和生活机会的获得是高度不平等的，就是在城市社会组织体系内不同工作单位之间也是如此。这样，即便工人被称为“国家的主人，在理论上享有最完美的公民身份，但他们依旧被国家的经济体制组织到了社会分层制度之中。

因此，有学者从贝克个体化理论的分析视角出发，将政党和国家看作是初始个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个体摆脱了传统的血缘、社区和伦理关系并重新进入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结构之中（Yan, 2010），这与 19 世纪以来国家的政治精英力图在中国造就现代中国人的情形一样。但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种现代性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现代性，其中包含着解放的思想维度，特别是对于青年和妇女而言，他们被号召参加国家发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并且从中发现自己是作为公民而存在，而非仅仅作为家庭成员而存在（Yan, 2010）。因此，尽管在这一时期是“中国走向个体化道路的第一阶段”，但它仅仅是“制度性个体化的一半”（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10）。

2. 改革时期的阶级和公民

文革结束后，中国重新回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斯大林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下的“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的实践，即社会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改变，世袭的阶级标签被取消，阶级斗争被废止，以动员必要的力量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从而导致了中国第二阶段的个体化，创造了社会流动和空间流动的新机会（Scharping, 1995），使得中国人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中解脱出来重新进入新兴的市场社会的分层秩序之中（Yan, 2010）。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并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农民离开农村作为低薪工人或者小商小贩进入城市，并在城市中创造了“农民工”这一新的社会阶层，而这仅仅是中国广泛全面的社会流动以及多样性的一个表象。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中国的社会学者在世纪之交至少区分出了 10 个以上的社会阶层。尤为突出的是，阶级术语在中国社会形成的讨论中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缺少政治色彩的“阶层”提法和更加中性的“社会群体”用语（Goodman, 2008）。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演变过程不仅伴随着绝对贫困的大量减少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而且还伴随着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乡差距和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快速提高，这使人联想到了贝克所说的生活水平整体提高与社会不平等持续或恶化相伴的所谓“电梯效应”（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10）。因此，改革时代的中国在社会构建的结构方面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这一点已无需详述。

此外，这些结构性的社会变迁也反映在代表性层面上。自 21 世纪初以来，私营业主阶层已经逐渐被当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得到接纳和认可。这种对私营业主

的重新评价已于 2001 年中国共产党向私营业主开放入党资格并允许其入党而逐渐得以完成。当然，尽管最初并不是所有党员都同意接纳私营业主入党，但这代表着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显著转变。需要强调的是，许多的私营业主在过去其实都是国家干部或者国有部门的管理人员，他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私有化进程中获得了发展机会，其中很多人在成为私营业主之前就已经入了党。如果再细致观察，即使是许多“白手起家”的私营业主也是从一开始起就与党政部门有着较为紧密的社会联系，从而赢得了“红色资本家”（Dickson, 2003）的称谓。尽管社会上关于私营部门中的“投机倒把者”或者“低素质者”这类偏见依然存在，但目前这种社会偏见主要针对的是一些诸如街头小贩等从事小买卖或者小企业的业主，而非私营公司的大老板。根据公众和流行的话语分析（Hsu, 2007），与现代社会中“素质”成为有价值的社会成员的主要特征相一致，私营业主经商成功也由于被归结为高“素质”而被合理化。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业主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即从过去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社会被遗弃者，到现在成为具有包含市场经济寓意在内的具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社会成员而被全面接纳，甚至成为其他社会成员仿效的“角色样板”（Goodman, 2008）。部分私营业主甚至被吸纳进党代会或人代会等政治代议机构，并进而获得了全部的公民权利（Dickson, 2003）。

而在社会的另一端，城市中的农民工在过去也曾受到严重的歧视和边缘化，但他们在公众话语中的代表性却从过去最初具有贬低意味的“盲流”等称谓获得了很大的改变和提高。以往的各种具有否定意味的称谓与对城市农民工的不认可有关，但是，当这一社会群体变成恒久现象时，政府开始认识到他们对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巨大贡献，“农民工”这一更加中性的表述开始得到使用。另外，有时“民工”被作为与城市中“国有部门的工人”相对应的社会分类的“农民工”的简称，但当农民工中的“农”字被省略后，所剩下的“民工”二字就在官方话语中的“代表性”方面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在这样的概念中，不是用农民工自身的农村社会来源来进行定义，而是用他们在城市中目前的位置来进行定义。这样的表述更能贴近社会现实，因为目前很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Pun and Lu, 2010）。他们在公众话语中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可以从关于保护合法权益和利益（诸如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争论中得到解释和说明。此外，从农民工中的代表性人士进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事实看，也说明了农民工社会政治地位和阶层代表性的提高。但是，实际上，农民工还远没有享有全部公民权利的成果。物质权利是公民权利表达中的基石（Keane, 2001）。在获取物质利益方面，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发布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地方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农民工利益的实现还因为户籍制度的存在而受到阻碍（Chan and Buckingham, 2008）。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建立的户籍制度曾经有效地控制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也形成了改革开放前二元社会结构的基础。尽管目前户籍制度作为一个有效手段在阻滞人口迁移方面逐渐失去了其最初的社会功能，但它仍旧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障碍，从而造就了所谓的“地方公民权”，只有那些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才能够享有（Smart and

Smart, 2001)。由于无法获得户籍，农民工依旧无法享有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诸如子女的入学和教育等。但是，近年来关于农民工争议解决行为的研究显示此方面有了微妙变化。农民工似乎更加意识到了自身的权利，并且更愿意为之进行抗争。因此，一些学者从阶级形成的视角分析了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的行为，并将之称为“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上述对于私营业主和农民工的分析是作为对于相似的其他社会阶层进行讨论的例证，从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当代中国个体的解放和再融入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程，由于先前的社会体制弱化或者已经解组，社会成员因此得以自由——不论好坏，正如强制个体化原理所启示的那样。但是，对于中国新社会力量的研究还是使用了简单的现代化理论方法，因而无法充分地分析中国的社会变迁。

三、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二次现代性？

关于中国新社会阶层的研究，尤其是政治学者所进行的此类研究，通常都采用简单的诸如非自反性的现代化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例如，他们认为，工业化和中产阶级特别是私营业主阶层的崛起通常会引起对经济政治权利（公民权利）要求的日益增长；但他们在研究中却发现这一现象在中国其实并未发生（Dickson, 2008; Wright, 2010）。学者于是用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融入或后工业化的特殊性等来解释这种对标准模式的偏离。

这些分析尽管十分深刻，但并没有让读者留下完美的感觉。当所谓的“困惑”一次又一次被解开，但“简单的”现代化理论又不足以为解释新的社会力量提供最恰当的理论出发点（Dickson, 2008）。贝克关于第二次现代性多样性的理论可以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第一，它开拓了第一次现代性和第二次现代性的原则和制度重合或许可以共存的可能性（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10），甚至国家资本主义与后传统的权威主义治理也是如此。由此就走出了目的论的死胡同：虽然“稻草人”假设的出现，首先或者仅仅是用来反驳这些解释的根源，但笔者认为，这却使研究者失去了获得不同形式的真实现代性的可能性。第二，这种新的研究视角以两种方式重新定位了研究重点。一是从结构层面分析转向对于价值和代表性层面分析，这将加深社会行动人本身对此的理解；二是从生产领域转向从中形成阶级的再生产和消费领域。在再生产和消费领域，出现了大量的优秀分析研究，不少研究尽管并没有与贝克的理论相联系，但都涉及到了中产阶层的崛起，从而体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潜力（Goodman, 2008）。这些研究探析了“个体化一分为二”的社会寓意，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以供更好地理解职业和政治态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J. 艾弗利克（Jacqueline Elfick）对中产阶级消费状况的分析特别强调了贝克的“缺乏真正个性的个人主义”（Elfick, 2011）。相似的是，也有学者研究了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教育选择问题。M. 克莱布（Mary W. Crabb）观察到，一些经济上得益于改革的中产阶级家庭发现，自己正处在一种模棱两可的境地：不能自由选择所期望的生活追求，而是不得不做出选择来确保能够反映他们作为现代主体的能力和价值的生活（Crabb, 2010）。

克莱布的研究无意中回应了贝克的个体化论点。因此，此类研究显然更有可能与不同的观点——贝克个体化论点可以提供——相融合。

在农民工和其他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研究上，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情况。从维护公民权益的角度去研究农民工集体维权的文献不断增多。严（Yan Zhimin, 2010）将这些社会阶层的集体维权运动和其他种类的社会行动运动解释为中国个体化过程中“身份政治的形成”，同时又提醒说政党和国家依旧发挥着强大的作用。然而，这不应该理解成农民工、农民或者城市工人正在试图仅仅或主要通过争取经济政治权利来实现现代性；更确切地说，还包括在消费行为和私人生活上实现作为一个现代人的目标，这暗示了农民工是第二次现代性推动者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把农民工视为“未完成的无产阶级”（Pun and Lu, 2010）本身就预设了一个“无产阶级化处在第一次现代性中”的逻辑终点。可以说，这个终点从来没有到达过，甚至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并且长期以来被新形式的工人阶级身份所替代。换言之，这里的潜在假设是，个体化将会采用已经出现（或者确切地说尚未出现）于西方的相同社会模式。

相反，中国的阶级和公民的渐进式演化可能导致大相径庭的模式。农村的自治发展可以提供例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居民被赋予了通过选举村委会来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利（Schubert and Heberer, 2009）。尽管在制度和实施上还不够完善，但这一制度却赋予了农民比城市居民更为全面的公民权利（O'Brien, 2001）。这与一般话语中将把农民视为素质不高因而需要国家积极干预来帮助他们实现“现代化”形成了鲜明对比（Murphy, 2004; Brandtsättter, 2011）。对此，T. 海贝勒（Thomas Heberer）和G. 舒伯特（Gunter Schubert）发现，与公民积极推动民主参与不同，居民对社区事务保持冷漠和缺少兴趣（Heberer and Schubert, 2008）；反而是政府在推动居民参与社会事务。据此，作者们将此种现象解释为这是一种以自上而下方式来创造公民权的努力。对于“简单的”现代化理论而言，要解决这种二元悖论是很难的；但第二次现代性的“并列”逻辑似乎恰恰在此起了作用，即“落后”和“进步”同时并存。然而，这些新身份的中国特色在于作为权利赋予者的国家起了关键作用，而不是关于国家必须承认和保护公民享有权利的自由民主理解发挥了作用。这揭示了一种可能性，即以貌似合乎逻辑和保持一致的方式出现在西方世界的现代性元素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被组合起来。先前被认为现代性必不可少的某些因素甚至可能会丢失（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10）。

当然，判定贝克的第二次现代性理论对于中国是否成立还为时过早。事实上，将近30年的辩论和理论发展还没有终结该理论对于其理论发源地本身是否适用的争论。但是，本文认为，这一理论中的一些元素（诸如个体化观点）完全可以解答在中国快速变迁的背景下出现的新问题，并有助于从理论推理的死胡同走出来。因此，从这一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揭示社会变迁过程中纷繁复杂的现象，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反思西方的现代化经验，这是非常值得的。

参考文献：

1. Atkinson, Will. 2007. "Beck, Individualization and the Death of Class: A Critiqu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8(3): 349–66.
2. Beck, Ulrich. 1983. "Jenseits von Klasse und Stand? Soziale Ungleichheiten, gesellschaftliche Individualisierungsprozesse und die Entstehung neuer sozialer Formationen und Identitäten". In *Soziale Ungleichheiten, Sonderband 2 der Sozialen Welt*, edited by Reinhard Kreckel, 35–74.
3.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Trans. Mark Ritter,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4. Beck, Ulrich. 1993. *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Zu einer Theorie reflexiver Modernisierung*. Frankfurt: Suhrkamp.
5. Beck, Ulrich. 2000. "The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Sociology of the Second Age of Modern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1): 79–105.
6. Beck, Ulrich. 2007. "Beyond Class and Nation: Reframing Social Inequalitie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8(4): 679–705.
7. Beck, Ulrich. 2008. *Die Neuvermessung der Ungleichheit unter den Mensche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im 21. Jahrhundert*. Frankfurt: Suhrkamp.
8. Beck, Ulrich; Beck-Gernsheim, Elisabeth. 2010. "Chinesische Bastelbiographie? Variationen der Individualisierung in kosmopolitischer Perspektive". In *Fragile Sozialität. Inszenierungen, Sinnwelten, Existenzbastler*, edited by Anne Honer, Michael Meuser, Michaela Pfadenhauer, 199–206.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9. Beck, Ulrich; Grande, Edgar. 2010. "Varieties of Second Modernity: The Cosmopolitan Tur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nd Research".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3): 409–43.
10. Beck, Ulrich; Lau, Christoph. 2005. "Second Modernity as a Research Agend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plorations in the 'Meta-Change' of Modern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6(4): 525–557.
11. Berger, Peter A.; Hitzler, Ronald (eds.). 2010. *Individualisierungen. Ein Vierteljahrhundert "jenseits von Stand und Klasse"?*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12. Calhoun, Craig. 2010. "Beck, Asia and Second Modern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3): 597–619.
13. Chan, Kam Wing; Buckingham, Will. 2008. "Is China Abolishing the Hukou System?" *China Quarterly* 195: 582–606.
14. Crabb, Mary W. 2010. "Governing the Middle-Class Family in Urban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Questions of Choice". *Economy and Society* 39(3): 385–402.
15. Dickson, Bruce J. 2008.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 Elfick, Jacqueline. 2011. "Class Formation and Consumption Among Middle-Class Professionals in Shenzhe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1: 187–211.
17. Goodman, David S.G. (ed.). 2008. *The New Rich in China: Future Rulers, Present Lives*. London: Routledge.
18. Hansen, Mette Halskov; Svaverud, Rune (eds.). 2010. *China. The Rise of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Copenhagen: NIAS Press.
19. Heberer, Thomas; Schubert, Gunter. 2008. *Politische Partizipation und Regimelegitimität in der VR China. Band I: Der urbane Raum*.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 Hsu, Carolyn L. 2007. *Creating Market Socialism: How Ordinary People are Shaping Class and Status in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1. Keane, Michael. 2001. "Redefining Chinese Citizenship". *Economy and Society* 30(1): 1–17.

22. Murphy, Rachel. 2004. "Turning Peasants into Modern Chinese Citizens: 'Population Quality' Discours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Primary Education". *China Quarterly* 177: 1–20.
23. Nollmann, Gerd; Strasser, Hermann. 2002. "Individualisierung als Deutungsmuster sozialer Ungleichheit. Zum Problem des Sinnverstehens in der Ungleichheitsforschung".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27(3): 3–36.
24. O'Brien, Kevin J. 2001. "Villagers, Elections and Citizenship". *Modern China* 27(4): 407–35.
25. Pun, Ngai; Lu, Huilin. 2010.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 *Modern China* 36(5): 493–519.
26. Scharping, Thomas. 1995. "Vom Ständestaat zur mobile Gesellschaft. Migration und Systemwandel in der VR China". *Geographische Zeitschrift* 3/4: 135–49.
27. Schubert, Gunter; Heberer, Thomas. 2009. *Politische Partizipation und Regimelegitimität in der VR China. Band I: Der ländliche Raum*.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8. Smart, Alan; Smart, Josephine. 2001. "Local Citizenship: Welfare Reform, Urban/Rural Status, and Exclusion in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33: 1853–69.
29. Walder, Andrew G.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30. Wright, Teresa. 2010.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1. Yan, Yunxiang. 2010. "The Chinese Path to Individualiz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3): 439–512.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江树革 译)